

作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家中央银行，南京中国银行开业后随即大刀阔斧发行了“南京券”。卓有功勋的“南京券”后来被誉为“共和第一钞”。不过，在“南京券”的真面目浮出水面之前，“共和第一钞”的历史地位差点被“李鸿章像券”抢去。“李鸿章像券”与“南京券”对“共和第一钞”的争夺从何而起？身为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头像为何会出现在民国货币上？

揭开“南京券”神秘面纱



二档馆藏“南京券” 因钞面上印有“南京”而得名

位于南京中山东路上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珍藏馆里，陈列着南京中国银行自印发行、并被誉为“共和第一钞”的“南京券”。

“南京券”分一元券和五元券两种：

一元券长134MM，宽81MM，正面：基色是赭色，底纹是极淡的浅蓝色，实心字是黑色。下边框内嵌有空心字“南京”。由于钞面上印有“南京”二字的地名，遂以“南京券”得名。自右至左，边框下有一行小字“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背面：边框绿色，底纹极淡的黄色，文字黑色，号码红色。反面为英文，有经理邹颂丹和会计主任叶济仙的中文签名。

五元券长148MM，宽93MM，正面：基色为蓝色，底纹是极淡的浅蓝色，实心字是黑色。下边框内嵌有空心字“南京”。由于钞面上印有“南京”二字的地名，遂以“南京券”得名。自右至左，边框下有一行小字“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背面：边框绿色，底纹极淡的黄色，文字黑色，号码红色。反面为英文，有经理邹颂丹和会计主任叶济仙的中文签名。

五元券长148MM，宽93MM，正面：基色为蓝色，底

纹是淡草绿色，实心字呈黑色。背面：边框橘黄色，底纹是淡青蓝色，文字黑色，号码红色。其式样与文字，与一元券基本相同，仅面值相应改变。一元券和五元券正面两边冠有中国银行发行日期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吉日”和“中国银行发行”两排中文字。背面英文日期为“Nanking 10th February 1912”，即1912年2月10日。

根据“南京券”上冠有的中文发行日期“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吉日”和背面英文日期“Nanking 10th February 1912”，即1912年2月10日，可以推算出“南京券”的印制时间，应当是在孙中山先生1月24日在南京批准成立中国银行之后，及2月10日预备发行日之前。

荣登“共和第一钞” “南京券”击败“李鸿章像券”

由于民国初期时局动荡，“南京券”的发行及流通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流通地域也不够广泛(主要在南京地区)，“南京券”散在民间所存极少，很多人从未见过“南京券”。与此同时，资料显示，中国银行成立后，曾用大清银行李鸿章兑换券一圆、五圆、十圆三种加印“中华民国元年”和“中国银行兑换券”及地名、签字等字样，暂代流通。这使得不少海外钱币学家长期认为，中国银行于1912年2月草创时来不及自行印制钞票，因此“李鸿章像券”被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种钞票。

孔祥贤，这位已故的南京中国银行员工，中国银行行史研究资深专家，通过详细的考证，终于给“南京券”正名。

孔祥贤先生曾查到的中国银行第一套报表(民国元年十月十五日呈报财政部)中有一张《中国银行流通钞票数目及金额一览表(民国元年九月份)》，上列北京、上海、南京三行，其中南京行流通在外的一元券为306张、五元券为2000张，合共发行10306元，而其面值系统似不同于其他两行。之后数年，孔祥贤先生又陆续查

找到一些关于“南京券”的发行和收回销毁方面的资料，只是一直未见到“南京券”实物。

也许是孔祥贤先生执着追寻“南京券”的精神感动了上苍，1988年，孔祥贤先生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吴仁元先生的委托，帮助整理馆藏的部分旧钞(以中行钞为主)，他终于在一大堆散乱的钞票中，发现了“共和第一钞——南京券”。

“南京券”的发现立刻轰动了海内外钱币界。

1988年10月13日，新华社以题为“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种钞票——中国银行的‘南京券’最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被发现”作了报道。新华社报道中说：“据‘南京券’的发现者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银行行史专家、副研究员孔祥贤介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国家银行只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于前清，中国银行是新建的，并取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所以中国银行的第一种钞票就是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种钞票”。

“南京券”的发现，否定了“李像券”是中国银行第一种钞票的成说，从而修正了货币史上的一个讹误”。商界态度的转变，对整个社

金融大战，白下路23号赢了袁世凯



袁世凯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导致中央财政吃紧，不得已谋划颁布“停兑令”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谈荔孙，从减少民众损失等方面出发，主张在江苏省内有限制兑现印有江苏省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



1916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签发了“停兑令”，命令中、交两行自奉令之日起不准兑现、付现



北洋大员、江苏督军冯国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力支持谈荔孙

因时局变化，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时代结束，白下路23号的光彩也黯淡了。1912年8月1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开业，遂将上海、南京中国银行改称分行。南京中国银行定名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即便如此，在袁世凯当政时期，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仍旧有卓越的表现。

□本版整理 快报记者 白雁

扩大军备财政吃紧 袁世凯谋划让两大银行“同归于尽”

北洋政府从组成时起，财政收支就十分拮据。1912年9月至12月4个月，政府总收入2719万元，总支出7009万元，不敷数达4290万元。1916年，讨袁的护国战争烈火，已烧遍大江南北。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中央财政面临枯竭。于是北洋政府就开动机器印钞票，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到1916年5月“停兑令”公布

前，两行共发行兑换券7000多万元，而准备金只有2000多万元。

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随着北洋政府军政费用的急剧增加，引起了通货膨胀和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中、交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军队也以“不相信纸币”为理由，要求发给现洋。袁世凯政府就从各银行库存将现银发给军队，于是中、交两行现银库存大量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为稳住金融盘子，于是，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向政府谋划了中、交两行同时停兑的方案。梁士诒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使各省中、交两行的库存现银一律解京；二是可借口维持金融，要求外国借款；三是交通银行困难已达极点，而中行情况尚非如此严重，把两行拉在一起对交通银行有利，“即使有事，两行同归于尽，也比只牺牲交行一家要好”。

保一方苍生 金融巨子谈荔孙南京勇抗“停兑令”

1916年5月12日，由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签发了国务院第二号令(即国务院“停兑令”)，命令中、交两行自奉令之日起不准兑现、付现。

在国务院发布“停兑令”之前，中、交两行曾电询各自分支机构对于停兑的意见，交通银行因受梁士诒影响，表示无意见。而中国银行则表示反对，据当年《新闻报》载，中、交两行总行在院令发布前，“曾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中国银行的分行中“尤以上海、汉口、南京、镇江等行反抗最力”。

当时冯国璋不仅在江苏省担

任着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且在整个北洋政府系统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谈荔孙找到冯国璋商议应对“停兑令”办法，从减少民众损失、维护中行信誉、保持市面稳定等方面出发，主张在江苏省内有限制兑现印有江苏省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得到了冯国璋的支持。

5月12日“停兑令”颁布后，中国银行南京、上海等分行都立即向中行总行去电陈述不能执行“停兑令”的理由，在中行系统中，南京分

行去电最早。

5月15日《申报》公开报道了南京中国银行抗“停兑令”相关情况：“冯将军亦不赞成——闻南京冯将军亦不赞成此令，特嘱南京中国银行照常营业收兑钞票，并发给现洋三十万，交中国银行以资周转。”由于冯国璋将军的支持，更增添了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抗“停兑令”的信念和力量。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及所属，如苏州、无锡、常州等行亦照常兑现。5月17日《申报》也报道了苏州照常兑现的情形：“已由宁行运载现洋来苏照常兑现”。

袁世凯发通告检讨“停兑令” 白下路23号赢了这场金融战

其实，“停兑令”不仅损害了中、交两行的信誉，也损害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他们纷纷反对。5月12日，政府宣布停兑后情况就大不相同，北京市场顿起恐慌，两行纸币跌到六折。粮、盐、油、炭、日用品及洋货奢侈品价提高三四成，米价比原价增加了百分之五，金价每两50元增至80元，当铺则止当候赎，商号则停止交易，生意萧条，市况惨淡。一般政府官吏，早在停兑前就对强行减俸和搭发公债券十分不满，现在又拿到不断跌价的纸币，生活水平降低很多，诅咒袁氏之声，甚嚣尘上。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商界，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中立，其时也越来越倾向于“非去袁不可”。商界态度的转变，对整个社

会产生深刻影响。

当时，冯国璋召集的17省区南京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沪宁商会拒绝停兑的消息传来，冯国璋等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不与商会采取一致态度，感到“大势所趋，必非武人所能抗矣！”

在金融界，5月15日，中行股东联合会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支行，阐明了抗“停兑令”的理由：“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付存，无异于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电文再次批评政府措施不当，表示了抗拒停兑的决心。中行股东联合会5月15日通电发表后，率先复电赞成的也是江苏省的上

将军冯国璋、巡按使齐耀琳，认为事关国脉存亡，自当竭力维持。

“停兑令”等于宣布政府金融政策的破产，其结果是使筹资更加困难，百姓恐慌，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投机家兴风作浪，加深了危机。“停兑令”也损伤了外国在华企业的利益，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对袁世凯政府也是怨声载道。袁世凯政府为挽回人心，于6月1日以“总统府令”的形式发表了一个措词含糊的通告，其令文中提到：“……暂停兑现，实系一时权宜之计，非不兑换纸币可比。维闻迩来商民惑惑，弊窦丛生，于财政前途，大有关碍。现饬国务院筹拟办法，以重市廛。……”以缓和人心。